

难的是什么？是8000米的极限缺氧高反？是60度望不到头的绝望坡？还是零下几十度的暴风雪？

她说：都不是。“最难的那一刻，是我从8200米被迫下撤，退到6400米的二号营地的时候——耳边全是队友死亡、截肢的消息，国际救援保险已经过期，下一个窗口期谁也说不准，我裹在睡袋里，坐着都喘得厉害，咳得肺都疼。那时候我问自己：你还敢不敢，再往上走一次？”

这个决定显而易见地艰难：第一，命还要不要？国际救援保险已经过期，再往上就是“裸爬”，出任何事都没有救援保障；第二，钱还够不够？二次冲顶，公司要加收10万元人民币，立刻到账，不容分说；第三，窗口期还有没有？高原天气说变就变，钱砸进去很可能打水漂；最后，也是最现实的问题：第一次冲顶已经耗空了大半体力，要从6400米再爬一遍几乎垂直的洛子壁、重走一遍死亡路线，身体扛不扛得住？

相熟的向导悄悄劝她放弃。但她还是狠下心，换了一个向导，付了10万元的费用——“这真的是史上最贵的一泡尿了！”

新的向导名叫尼玛扎西，是登顶成功的队友推荐给阿思的，说他人特别好，也特别负责。“扎西跟我见面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收拾东西出发，是把我所有装备

右图：阿思和扎西捧着大本营为他们制作的庆贺蛋糕。



挨个检查了一遍。是他发现我的氧气面罩尺寸太大，当场给我换了合适的，调好氧气流量——就这一个动作，我就知道，这次不一样了。”

5月25日早晨，阿思和扎西从海拔6400米的二号营地出发，开始第二次冲顶。

真正的考验，仍旧是从三号营地到四号营地的那段“死亡之路”。越往上爬，风越大。“大到什么程度？风雪打在脸上像刀子割，连呼吸都困难；风最猛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像按了暂停键，弓着背侧过身，用身体扛着风，等风势稍减，赶紧往前挪几步。更致命的是，大风把上千人踩实的脚印全吹没了。原本像楼梯一样好走的雪坡，变成了光滑一片，连路线都找不到。我只能用力将脚上冰爪的尖刺插进垂直的冰壁，自己开路。”

整整13个小时后，她终于爬到了四号营地。可眼前的景象，却像世界末日：“原本密密麻麻挨在一起的几十顶帐篷，全被狂风撕成了碎片，彩色布条挂在石头上，物资散了一地，黑褐色的碎石裸露着，整个营地一片狼藉。连扎西都愣住了——我们公司的帐篷，没了。”

最后，他们找了个其他公司剩下的空帐篷。“风在外面咆哮，帐篷晃得像随时会被撕碎，我累到极致，居然睡着了。”

醒来时是晚上八点半，风小了。阿思和扎西穿戴好装备，再次冲顶！

“出发前我跟他约定：你在前面走，我跟在你身后一步远，我不抬头，不看还有多远，就盯着你的脚后跟走。因为珠峰的坡又陡又长，一抬头望不到头，人很容易就泄了气。最好的办法，